

青年“孝而不顺”观念与代际养老模式 重构研究

魏雨晴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管理学院, 上海

收稿日期: 2026年3月12日; 录用日期: 2026年4月14日; 发布日期: 2026年4月27日

摘要

本文探讨中国家庭代际伦理从“权威-服从”向“平等-互惠”转型过程中, 青年群体“孝而不顺”观念的内在生成逻辑及其对代际养老模式的影响。基于孝道二元理论框架, 采用文献分析法, 系统梳理2015~2024年代际关系变迁的学术研究与政策文本。研究发现: 青年群体的“孝而不顺”观念呈现价值层面、行为层面、关系层面三重维度, 这一观念转型驱动代际养老模式在居住模式、支持方式、伦理基础上发生结构性重构。“孝而不顺”并非传统孝道的衰落, 而是孝道现代性转型的体现, 其内核是从“权威性孝道”向“相互性孝道”的范式转换。政策制定应从强化子女义务转向构建代际支持体系。

关键词

“孝而不顺”, 二元孝道, 代际互惠, 养老模式重构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But Not Obedience” among Young People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ntergenerational Pension Model

Yuqing Wei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Science, Shanghai

Received: March 12, 2026; accepted: April 14, 2026; published: April 27, 2026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internal generation logic of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but not obedience”

among young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ethics from “authority-obedience” to “equality-reciprocity” and its impact on the intergenerational pension model. Based on the dual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filial piety, this paper uses literature analysis to systematically sort out academic research and policy texts on the changes in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 from 2015 to 2024.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cept of “filial piety but not obedience” among young people presents three dimensions: value, behavior and relationship, and this concept transformation drives the structural reconstruction of the intergenerational pension model on the basis of living mode, support mode and ethics. “Filial piety but not obedience” is not the decline of traditional filial piety, but the embodiment of the modernity transformation of filial piety, and its core is the paradigm shift from “authoritative filial piety” to “mutual filial piety”. Policy formulation should shift from strengthening children’s obligations to building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systems.

Keywords

“Filial Piety But Not Obedience”, Dual Filial Piety, Intergenerational Reciprocity, Reconstruction of the Pension Model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1. 引言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4 年末 60 岁及以上人口达 3.1 亿, 占总人口的 22.0%, 标志着我国已正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1]。与此同时, 家庭结构发生深刻变迁: 家庭户均规模从 1982 年的 4.41 人降至 2020 年的 2.62 人, 三人户及以下家庭占比超过 76% [2]。这一“老龄化”与“少子化”叠加的双重压力, 使传统家庭养老功能面临严峻挑战。复旦大学 2024 年发布的《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09~2024)》揭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趋势: 青年网民在涉及赡养父母的问题讨论中, 愿“孝”不愿“顺”的比例从 2013~2018 年的 6.8% 显著上升至 2019~2024 年的 13.4% [3]。这一数据折射出青年群体对代际关系的重新定位——他们依然认同赡养父母的道德义务, 但拒绝无条件服从长辈的权威意志。

人类学家阎云翔在 2017 年指出, 21 世纪以来“孝而不顺”已成为大多数村民接受的对孝顺的新理解, 通过放弃要求晚辈服从长辈, 成为消除代际冲突的主要原因[4]。2024 年, 陈滔、胡安宁基于 CFPS 数据的实证研究证实, 中国家庭正经历从“权威性孝道”向“相互性孝道”的转型, “相互性孝道”显著促进老年父母的幸福感, 而权威性孝道的作用则趋于衰减[5]。

这一观念转型对代际养老模式产生了深远影响。2024 年 12 月,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代际融合”“发展互助养老”等创新方向[6], 政策话语的转变正是对代际关系变迁的制度回应。

2. 理论基础

2.1. 孝道二元模型

传统孝道研究长期受“单维范式”主导, 将孝道视为从“绝对服从”到“完全抛弃”的线性演变过程。叶光辉、杨国枢在 20 世纪 90 年代突破这一局限, 提出“孝道二元模型”, 将孝道区分为“权威性孝道”与“相互性孝道”两个维度[7]。权威性孝道强调子女对父母的角色义务、等级服从与自我克制, 其心理机制是“报偿”与“压力”; 相互性孝道则强调亲子之间的情感亲密、平等互惠与自主协商, 其

心理机制是“亲密”与“自愿”[8]。

这一理论框架为理解“孝而不顺”现象提供了关键钥匙。“孝”对应相互性孝道的情感维度，“不顺”则对应对权威性孝道的拒斥。2024年多项实证研究验证了这一理论在中国社会的适用性。陈滔、胡安宁利用CFPS 2014、2016、2018、2020年数据发现，相互性孝道显著促进老年父母的幸福感，而权威性孝道的影响不显著性为正[5]。这一发现与西方社会的研究形成有趣对比：在西方，孝道观念整体衰落导致代际支持减少；而在中国，孝道观念的双元分化——相互性孝道上升、权威性孝道下降——并未削弱代际支持，反而通过提升支持质量增强了代际关系的情感温度。

青年群体的“孝而不顺”并非简单的维度分化，而是呈现出“选择性亲和”特征：他们高度认同“尊敬父母”“关心父母健康”等相互性孝道内涵，但对“婚后与父母同住”“无条件顺从父母意见”等权威性孝道要求明确拒绝[9]。这种选择性认同使青年群体的孝道观念呈现“高相互性-低权威性”的失衡结构，与传统社会的“双高”模式(高相互性-高权威性)和西方社会的“双低”模式均不相同。

2.2. 代际交换理论

费孝通提出的“反馈模式”长期被视为中国代际关系的经典概括，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赡养甲代，下一代对上一代都要给以反馈[10]。这一模式建立在代际交换的“公平逻辑”之上，强调代际责任的平衡与代际资源的流动。然而，反馈模式隐含两个前提：一是代际居住的空间邻近性，二是代际权力的不对称性。这两个前提在转型期中国均受到冲击。

人口流动深刻改变了代际居住模式。2024年研究显示，代际居住距离增加显著降低农村家庭子女对父母的养老支持，但对城市家庭影响不显著[11]。这一发现揭示了居住模式与养老功能的复杂关系：地理距离的扩大并未必然导致代际支持的断裂，关键在于支持方式的转型。城市家庭通过“分而不离”模式——即代际分居但保持频繁的情感联系和工具性互助——维持了代际团结，而农村家庭由于数字化程度较低、社会保障薄弱，更依赖面对面的日常照料[11]。

代际权力关系的变化同样显著。复旦大学2024年报告指出，青年网民将“自我”和“父母”放在平等位置权衡，追求“平等代际关系”的比例显著上升[3][12]。这种平等化趋势并非西方个体主义的简单移植，而是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协商式亲密”——子女在重大决策上寻求父母意见，但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父母尊重子女的自主选择，但期待情感回报的及时性[9]。这种新型代际关系被学者称为“下行式家庭主义”——家庭资源与关注重心向下一代倾斜，但代际之间的情感纽带反而强化[4]。

3. “孝而不顺”的观念特征

3.1. 价值层面：从“权威性孝道”到“相互性孝道”

青年群体“孝而不顺”观念并非是对孝道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孝道二元维度的差异化采择——强化相互性孝道，拒斥权威性孝道。

相互性孝道的强化体现在青年群体对父母情感需求的高度敏感。2024年复旦大学报告显示，在涉及代际关系的话语中，“理解”“尊重”“陪伴”等情感类词汇出现频率显著上升，而“听话”“顺从”“服从”等权威类词汇使用频率下降[3]。青年群体普遍认同“常回家看看”“打电话问候父母”“关心父母身体健康”等相互性孝道要求，将其视为不可推卸的道德义务。这种认同源于双重机制：一是情感内化机制，即青年在成长过程中感受到的父母关爱内化为回报意愿；二是社会期待机制，即社会对“孝顺”的舆论评价依然具有强约束力，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面临显著的社会污名[9]。

权威性孝道的拒斥则表现为对代际等级关系的明确抵制。青年群体对“婚后与父母同住”“无条件

顺从父母意见”“父母有权决定子女职业选择”等权威性孝道要求的认同度显著低于中年群体[8]。这种拒斥并非简单的“代际反叛”，而是基于理性计算的自我保全策略。在房价高企、职场竞争激烈的结构性压力下，青年群体将“居住自主”“职业自主”“婚恋自主”视为维护个人发展机会的必要条件。正如阎云翔在田野观察中发现的，村民们通过放弃对晚辈服从的要求，换取了代际冲突的消解与家庭和睦的维持[4]。青年群体的“不顺”，本质上是以退出权威竞争的方式，避免代际关系的零和博弈。

3.2. 行为层面：从“物质供养”到“精神慰藉”

传统养老模式以经济供养为核心，子女通过提供生活费、医疗费、居住空间履行赡养义务。而“孝而不顺”观念主导下的代际支持，呈现情感支持优先化的特征。

经济支持的“脱核心化”并非指经济供养的消失，而是其不再作为代际关系的唯一或首要纽带。随着养老保险覆盖面扩大和老年人自有财产增加，父母对子女经济支持的依赖性降低。2024年数据显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5.3亿，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5.5亿，基本养老金待遇水平持续提升[6]。经济独立性的增强，使老年人更倾向于将子女的经济支持视为锦上添花而非雪中送炭，转而更看重子女的情感陪伴与尊重。

情感支持的“显化”体现在沟通频率、互动质量与情感表达三个层面。在沟通频率上，“数字反哺”成为代际互动的新常态——子女教父母使用智能手机、视频通话、社交媒体，既解决了老年人的数字鸿沟问题，又创造了高频次的互动契机[13]。周裕琼的研究发现，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象普遍，青年子女是数字反哺的主要提供者[14]。在互动质量上，青年群体更注重与父母的精神交流，如分享工作生活、讨论社会热点、共同旅游休闲，而非仅限于事务性沟通。在情感表达上，爱的话语从禁忌走向日常，青年群体更习惯于直接表达对父母的关心与爱意，打破了传统代际关系的情感压抑[15]。

生活照料的“市场替代”与“远程化”是另一重要趋势。由于不与父母同住，青年群体难以提供日常起居照料，转而通过两种途径解决：一是市场化购买，即为父母购买家政服务、送餐服务、护理服务；二是技术中介，即通过智能家居、远程监控、紧急呼叫系统实现“不在场的照料”[11]。2024年适老化智能家居市场渗透率已达12%，预计2029年将达25% [16]，技术正在重塑代际照料的空间形态。

3.3. 关系维度：从“单向服从”到“双向互惠”

传统代际关系建立在“父慈子孝”的伦理预设之上，但权力重心明显偏向父辈，子辈的“孝”以“顺”为表现形式，实质是单向度的角色义务。而青年群体倡导的“孝而不顺”，则将代际关系重新界定为双向互惠的平等协商。

代际互惠的“去等级化”表现为决策权的分享与协商机制的建立。在家庭重大事务(如购房、婚嫁、育儿)中，青年群体不再无条件遵从父母意见，而是采取“告知-协商-决定”的模式：将决策告知父母，听取父母意见，但最终决定权掌握在自己手中[9]。父母也逐渐适应这一模式，从“决策者”转型为“顾问者”。这种转型并非代际权力的简单让渡，而是基于情感互惠的理性调整——父母意识到，尊重子女的自主权是换取情感回报的前提条件。这种“重点支持+日常脱钩”的模式，既维护了代际情感纽带，又保留了个体的生活空间。

代际边界的“清晰化”是维持双向互惠的制度保障。青年群体通过“分户”“分财”“分事”三条路径确立代际边界：分户即婚后独立居住，避免日常摩擦；分财即经济独立核算，避免财产纠纷；分事即明确各自责任领域，父母不干涉子女职业与婚恋，子女不干预父母再婚与消费[17]。边界的清晰化并非代际疏离，而是通过降低互动频率中的冲突概率，提升互动质量中的情感浓度。

4. 代际养老模式的结构性重构

“孝而不顺”观念的三重维度转型，驱动代际养老模式发生系统性重构。这种重构不是对传统的彻底颠覆，而是在保持家庭养老核心地位的前提下，对养老支持的主体、方式、空间进行适应性调整。

4.1. 居住模式：从“同居共养”到“分而不离”

居住安排是养老模式的基础设施，直接影响代际支持的可达性与日常性。传统养老模式以“三代同堂”或“毗邻而居”为理想形态，强调代际日常生活的空间嵌入。而“孝而不顺”观念推动的居住模式转型，可概括为“分而不离”——代际分居但保持功能联结。

“分”的必然性源于多重结构性压力。房价高企使大城市青年难以购置足够容纳三代人的住房；职场竞争要求青年投入大量时间精力，难以承担日常照料责任；代际生活方式差异(作息习惯、消费观念、育儿理念)导致同居摩擦成本上升[2]。2024年数据显示，家庭户均规模已降至2.62人，三人户及以下家庭占比超过76% [2]，代际分居成为主流形态。

“不离”的可能性则得益于技术赋能与交通改善。高铁网络缩短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视频通话实现了“虚拟共在”，智能家居提供了“远程照护” [16]。更重要的是，“孝而不顺”观念通过强调情感质量而非空间邻近，为代际分居提供了道德正当性——“不住在一起 ≠ 不孝，天天吵架才是不孝”成为青年群体的普遍共识。

“分而不离”的实践形态呈现多样性：一是“同城分居”，即代际居住在同一城市但不同社区，保持“一碗汤的距离”；二是“异地频联”，即代际居住在不同城市，但通过高频次通讯和定期团聚维持联系；三是“候鸟式迁移”，即父母冬季到子女居住地“候鸟养老”，夏季返回故土，实现季节性团聚 [11]。这些形态共同构成“分而不离”的光谱，而非单一模式。

4.2. 支持方式：从“家庭单一支柱”到“多元协同”

“孝而不顺”观念对养老支持方式的深层影响，在于重新配置家庭、市场、国家、社会四类主体的功能边界，形成多元协同的养老支持体系。

家庭功能的“精准化”。家庭不再是养老服务的“全能提供者”，而是聚焦于不可替代的情感支持与危机时刻的兜底保障。日常的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康复服务更多地通过市场购买或社会服务获得，家庭则承担“服务购买者”“质量监管者”“情感支持者”的角色。这种精准化既发挥了家庭的情感优势，又避免了家庭的照料超载。

市场机制的“嵌入化”。养老服务业在2024年迎来快速发展期，银发经济规模预计达9万亿元[18]。市场服务不仅补充了家庭照料的不足，更创造了新的代际互动契机——子女为父母购买服务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代理式孝顺”的表达。值得注意的是，市场嵌入并未导致家庭的“去责任化”，反而强化了家庭的“决策责任”——如何选择服务、如何监管质量、如何协调服务与情感的关系，成为子女新的责任领域。

国家责任的“制度化”。2024年12月《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推动普惠型养老服务覆盖全体老年人” [6]。长期护理保险在49个城市试点的基础上向全国推广，为失能老年人提供基本护理保障[19]。国家的制度性介入，降低了家庭面临的灾难性照料风险，使“孝而不顺”观念下的代际支持更具可持续性。

社会力量的“激活”。社区养老、互助养老、时间银行等社会创新模式在2024年加速发展。苏州等地探索“代际融合”养老，年轻人通过为老年人提供服务换取住宿，既降低了青年生活成本，又满足了老年人的陪伴需求[20]。这种“代际互惠”的社会创新，为“孝而不顺”观念提供了制度化的实践载体。

4.3. 伦理基础：从“角色义务”到“情感自愿”

养老模式重构的深层动力，在于代际伦理基础的范式转换——从基于角色身份的制度性义务，转向基于情感联结的自愿性承诺。

传统伦理的“角色锁定”特征明显。“孝”首先是一种社会角色要求，而非个人情感选择。子女之所以必须孝顺，是因为其处于“子”的社会位置，这一位置先于个体存在，具有先赋性与不可选择性。这种角色伦理的优势在于稳定性与强制性，劣势在于可能压抑个体自主性，导致形式上的孝顺、实质上的疏离。

现代伦理的“情感激活”则强调孝道的主体间性。青年群体的“孝而不顺”实践，将“孝”的根基从我是子女所以我必须孝转向我爱父母所以我愿意孝。这种转换并非否定角色义务，而是为角色义务注入情感能量，使其从“不得不为”变为“心甘情愿”。相互性孝道理论揭示，当孝道源于亲密情感而非角色压力时，其对父母幸福感的促进作用显著更强[5]。

“情感自愿”的伦理风险在于不确定性——当情感成为孝道的唯一基础，情感淡化是否必然导致孝道衰落？经验观察提供了不同的答案。一方面，情感确实具有流动性，代际冲突、长期分离、价值观差异都可能侵蚀情感基础；另一方面，情感也可以通过共同经历、仪式互动、记忆共享而持续生产。青年群体的“孝而不顺”实践，实际上是在探索情感再生产的机制——通过创造高质量的共处时光、建立新的代际仪式(如共同旅游、节日聚会)、共享数字生活(如教父母用新软件)等方式，在分居状态下维持并深化代际情感[13]。

5. 结语

5.1. 核心结论

本文基于孝道二元理论，系统分析了青年群体“孝而不顺”观念的生成逻辑及其对代际养老模式的重构效应，得出以下核心结论：

第一，“孝而不顺”是孝道现代性转型的中国形态，而非传统孝道的简单衰落。其核心机制是从“权威性孝道”向“相互性孝道”的范式转换，表现为情感支持的强化与权威服从的拒斥。这一转型既不同于西方个体主义的家庭疏离，也不同于传统集体主义的角色强制，而是“个体化团结”或“协商式团结”的独特道路[4] [17]。

第二，“孝而不顺”观念驱动代际养老模式发生三重重构：居住模式从“同居共养”转向“分而不离”，支持方式从“家庭单一支柱”转向“多元协同”，伦理基础从“角色义务”转向“情感自愿”。这些重构增强了养老模式的适应性与可持续性，但也带来了情感疏离、照料真空、数字鸿沟等新风险。

第三，观念变迁与制度创新之间存在互动张力。现行政策话语(如“家庭养老主体责任”)与青年实践(“孝而不顺”)之间存在一定错位，政策制定需要回应代际关系变迁的现实，从强化子女义务转向构建代际支持体系。

5.2. 政策建议

第一，重塑政策话语：从“子女孝顺”到“代际支持”。政策制定应承认并引导“孝而不顺”观念的积极功能，将政策重心从强化子女对父母的单向义务，转向构建代际之间的双向支持体系。具体包括：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中，增加“代际平等”“相互尊重”等原则性条款；在养老服务政策中，明确子女“情感支持”与“生活照料”的功能区分，鼓励子女通过购买服务、技术中介等方式履行照料责任；探索“代际友好型”住房政策，支持“一碗汤距离”的代际居住安排。

第二, 完善制度供给: 降低“孝而不顺”的实践成本。“孝而不顺”观念的有效实践, 依赖于完善的制度支撑。建议: 加快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全国推广, 降低失能老年人家庭面临的灾难性照料风险[19]; 完善养老服务业发展政策, 提高服务质量与可及性, 使子女“代理式孝顺”更具可行性; 建立“亲子假”“照护假”等制度, 保障子女履行情感支持的时间资源。

第三, 创新社会机制: 拓展代际互惠的实践空间。支持“代际融合”社会创新, 如推广“时间银行”互助养老、代际共居项目等, 为青年群体提供“孝而不顺”的制度化载体[20]。鼓励社区开展代际互动活动, 创造非亲属代际之间的互惠机会, 弥补家庭养老功能的不足。

第四, 弥合数字鸿沟: 技术赋能代际情感联结。将“数字反哺”纳入养老服务体系, 在社区设立“代际数字学堂”, 鼓励青年子女教授父母使用数字技术[13][14]。推动适老化智能产品研发, 降低老年人使用门槛, 使技术真正成为代际情感联结的纽带而非障碍[15]。

参考文献

- [1] 国家统计局. 2024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R].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5.
- [2] 国家统计局. 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 [R].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 2022.
- [3] 复旦大学传播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 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09-2024) [R]. 上海: 复旦大学, 2024.
- [4] 阎云翔. 社会自我主义: 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J]. 探索与争鸣, 2017(7): 4-15, 1.
- [5] 陈滔, 胡安宁. 何种孝道可以提升老龄人口福祉?——基于 CFPS 数据的分析[J]. 人口与发展, 2024, 30(2): 39-51.
- [6] 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Z]. 2024-12-30.
- [7] 叶光辉, 杨国枢. 中国人的孝道: 心理学的分析[M]. 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09.
- [8] 叶光辉. 华人孝道二元模型研究的回顾与前瞻[J]. 本土心理学研究, 2009(32): 101-148.
- [9] 刘汶蓉. 孝道衰落? 成年子女支持父母的观念、行为及其影响因素[J]. 青年研究, 2012(2): 22-32, 94.
- [10] 费孝通. 生育制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1] 王跃生. 中国家庭代际功能关系及其新变动[J]. 人口研究, 2016, 40(5): 33-49.
- [12] 桂勇, 郑雯, 黄荣贵. 中国网络社会心态调查报告(2009-2024) [J]. 社会学研究, 2024(6): 1-25.
- [13] 周裕琼. 数字弱势群体的崛起: 老年人微信采纳与使用影响因素研究[J]. 新闻与传播研究, 2018, 25(7): 66-86, 127-128.
- [14] 周裕琼, 丁海琼. 中国家庭三代数字反哺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J]. 国际新闻界, 2020, 42(3): 6-31.
- [15] 彭兰. 老年传播中的“破壁” [J]. 新闻与写作, 2021(3): 1.
- [16] 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老龄产业发展报告(2024) [R].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4.
- [17] 肖倩, 杨可. 寻找韧性: 代际关系视角下的农村养老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21, 36(3): 89-112.
- [18] 银发经济研究院. 2024年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R]. 北京: 中国老龄协会, 2024.
- [19] 国家医保局, 财政部. 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EB/O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0-11/05/content_5557630.htm, 2020-09-10.
- [20] 江苏省民政厅. 省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EB/OL]. https://mzt.jiangsu.gov.cn/art/2019/12/30/art_80061_9840557.html, 2019-12-30.